



一、官学生历史始末

1. 容闳的天津之行

2006年4月22日，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访问美国耶鲁大学发表讲演时说：“耶鲁大学是中美教育合作的先行者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。156年前，一位名叫容闳的中国青年走进了耶鲁大学校园，4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，成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。”



容闳晚年像

容闳（1828—1912），原名光照，族名达萌，号纯甫，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人。1828年（道光八年）11月17日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。父亲容丙炎曾在澳门打工，思想开通，支持容闳入澳门英国基督教牧师马礼逊办的预备学堂学习。1835年，父亲亲自驾小船送容闳前往，企盼儿子入“洋学堂”将来能当“通事”或“买办”，出人头地给家庭带来富足与希望。后来，学堂因故停办，加上父亲去世，12岁的容闳返回家乡，靠贩卖糖果为生。一次，有位农夫知其略懂英语，便打赌说：“孺子能言者，吾将以禾一巨捆酬汝劳。”容闳从容背诵26个字母，如讲演

一般。农夫惊讶，遂兑现承诺。搬禾回家的容闳深感西文“奇效”，更增添了学习信心。

不久，经友人介绍容闳重返澳门，在教会办的印刷所当童工，争取微薄工资补贴家用；还在传道士医生霍伯逊主任的巡行医院里干些杂役。1841年（道光二十一年），经霍伯逊介绍，容闳重新进入迁往香港的马礼逊学校读书。1847年（道光二十七年），在马礼逊创办的澳门预备学堂任校长的美国人赛繆尔·布朗（毕业于耶鲁大学），因“家属的身体羸弱，拟暂时离华”，表示“极愿携三五旧徒，同赴新大陆”时，容闳“首先起立”响应。于是，18岁的容闳说服母亲，和黄宽、黄胜两位同学追随布朗夫妇，一起搭乘同孚洋行的“亨特利思”号商船，从黄埔港出发奔赴美利坚。在布朗夫妇的帮助下，容闳先在马萨诸塞州著名的孟松预备学校学习；3年后的秋天，考入耶鲁大学，系统接受欧美文化教育，成为该校中国留学生第一人；5年后，获得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学位。在学期间，他学习刻苦，“读书恒至夜半”，“英文论说颇优，第二、三学期连获首奖”。为了解决经济困难，他负责为“共屋而居的20多个”三年级学生“司饮膳”；又为兄弟会管理图书，还被兄弟会举为司书人，每年给30美元酬金，以补生活之需；他擅长写作，喜欢哲学，在当地报纸上发表过多篇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，引起美国学者的注意；虽然在美国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，但是他毅然决然地返回祖国。他曾雄心勃勃地说：“我心里已经计划好将来所要做的事情。我决定使中国的下一辈子人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。如此，通过西方教育，中国将可以复兴，变成一个开朗、富强的国家。”

1856年（咸丰六年），28岁的容闳回国后，曾在帕克博士（美暂代公使）处做书记、在香港从事最高审判厅译员、在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翻译处实习、在专收中国丝茶的英国洋

行中供职，还做过茶叶经理人，长期的历练使他逐步成熟。1862年（同治元年），容闳应朋友李善兰等人邀请赴安庆湘军大营，两次会晤曾国藩。他提出“先立一母厂，再由母厂以造出其他各种机器厂”的观点与曾氏主张暗合，遂委以重任，并成为曾国藩幕府人员之一。第二年，曾国藩筹措68000两白银，命容闳赴美国购买“制器之器”。在上海容闳访求到美国精通专门机器的工程师哈司金，又去英、法等国机器厂实地考察、了解行情，然后签订了委托办理合同。到美国后，在哈司金的帮助下，终于与马萨诸塞州费屈伯格城的朴得南公司签了订货合同。1865年（同治四年），所订机器全部交货，他出色完成任务。曾国藩一方面命机器运往上海交李鸿章所办军事企业；另一方面认为容闳颇具胆识，上《容闳赴西洋采办铁厂机器有功请予奖励片》，向朝廷保举授容闳为五品候补同知，担任江苏巡抚衙门译员。从此，容闳走上中国洋务运动舞台。这期间，他与李善兰、丁日昌、徐寿、李鸿章等多位洋务派领袖结识，参与创建江南制造总局、翻译馆，筹组华商轮船公司，成为洋务运动中的一员战将。

1867年（同治六年），曾国藩到上海考察，容闳“知其于机器为创见，因导其历观由美购回各物，并试验自行运动之机，明示以应用之方法，文正见之大乐”。他趁机向曾国藩进言，建议在江南制造总局内附设一所兵工机械学校，使中国青年有机会学习机械制造原理，将来可以独立自主地管理工厂，因此深得曾国藩赞许。小试牛刀后，容闳孕育着更大的计划，他说：“予自请于曾文正，于江南制造局附设兵工学校。向所怀教育计划，可谓小试其锋。既略著成效，前者视为奢愿难尝者，遂跃跃欲试。”1868年（同治七年），清任命蒲安臣（卸任的美驻华公使）率领大清使团出访欧美，这极大地刺激了容闳。他认为，中国缺乏受过现代教育的外交人

才，原应由本国人从事的职位，不得已用外人充当，使国家大权旁落，中国的利益往往被忽视或出卖。因此，他面见刚刚荣升为江苏巡抚的丁日昌，提出派遣留学生的建议，获得“丁大赞许，且甚注意此事，命予速具详细说帖，彼当上之文相国，请其代奏”。

丁日昌（1823—1882），字禹生，广东丰顺县人。清末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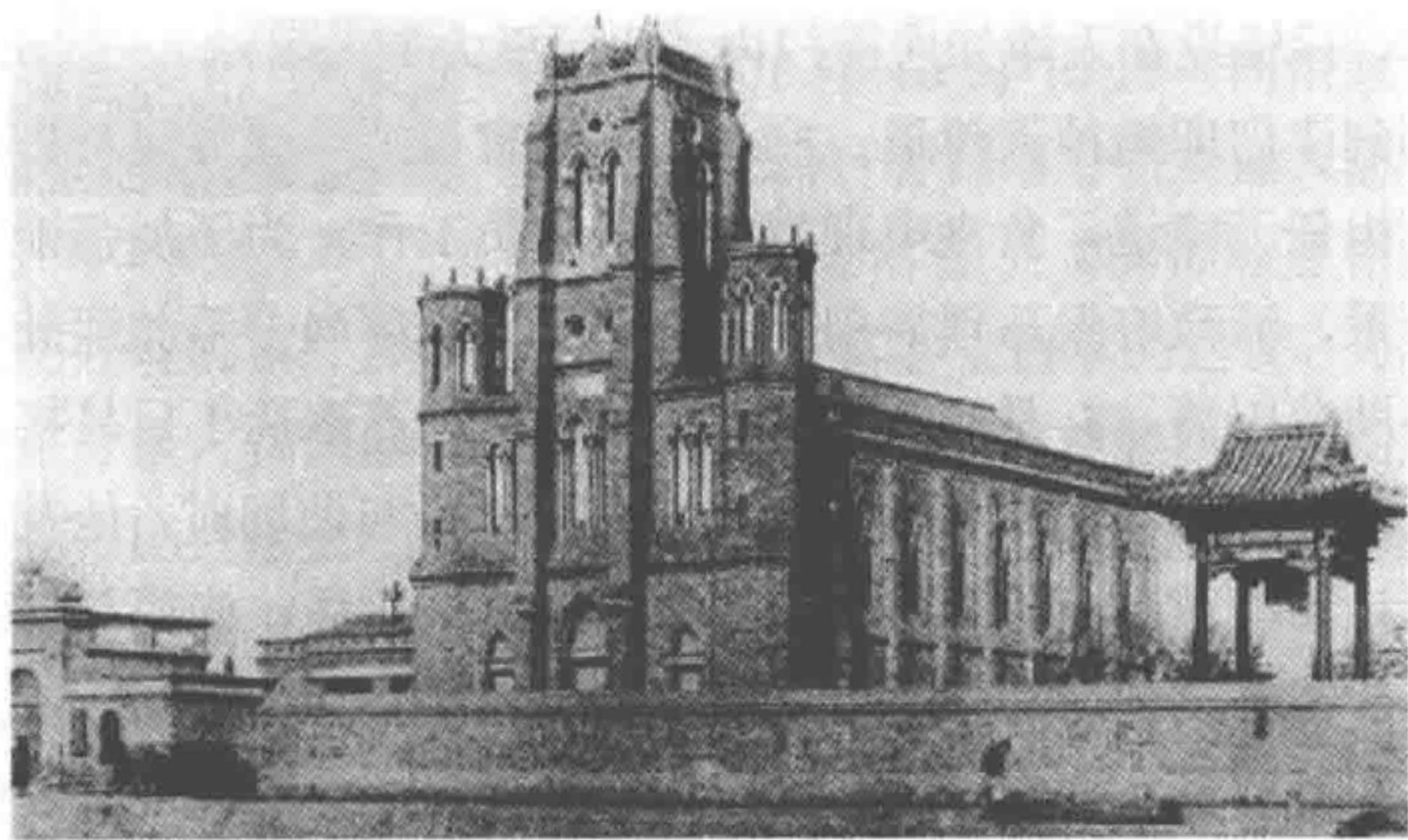
丁日昌晚年像

务运动中的杰出代表。早年中秀才，曾捐得儒学教官，并建立蓝田书院。因办团练有功，1857年（咸丰七年）升任琼州府儒学训导。太平天国期间，入曾国藩湘军大营幕府，办理厘金等。1863年（同治二年）春夏之交，李鸿章的淮军驻扎上海，请英人马格里办理西洋炮局，便把丁日昌揽于麾下，

设立两个洋炮局，丁“随同匠作，劳身苦思，究其精微”。而后丁日昌升迁甚速，相继任苏松太道（上海道）、直隶州知州、常州府道员、两淮盐运使、江苏巡抚等职，是洋务军火企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。1865年（同治四年），李鸿章派丁日昌督办江南制造局（地点在上海城西北约7公里的高昌庙），负责一切事务，恰在此时容闳购机器回国，容“与丁交颇投契”，过从甚密，遂成好友。11月，丁出任两淮盐运使，容闳“曾随至扬州，在扬州六个月，译哥尔顿所著之《地文学》一书”。他认为：“丁为人有血性，好任事，凡所措施，皆勇往不缩。”丁日昌赞同容闳的观点，只要有机会就积极鼓吹，是近代中国留学运动的有力推动者和不可或缺的人物。

容闳“亟亟返沪”，邀友合力撰写条陈，以便由丁日昌转寄北京。容闳在条陈中较完备地提出：“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，

送之出洋留学，以为国家储备人才。派遣之法，初次先定一百二十名名额以试行之。此一百二十人中，又分四批，按年递派，每年三十人。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。学生年龄，须以十二岁至十四为度。”“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同往。庶幼年在美，仍可兼习汉文。至学生在外国籍膳宿人学等事，当另设留学监督以管理之。此项留学经费，可于上海关税项下，提拨数成以充之。”这项留学计划很快呈寄给丁日昌。然而事不凑巧，军机大臣文祥因“丁忧”奔丧守制，奏折被搁置在军机处。随后，文祥去世，这次努力如泥牛入海，毫无消息。容闳得知实情后，无限感叹地说：“予目的怀之十年，不得一试。才见萌蘖，遽遇严霜，亦安能无怏怏哉。失望久之，烬余复热。”但是，容闳并不灰心，他终于得到机会。



1866年，谢福音修建的圣母得胜堂即俗称望海楼教堂，
天津教案发生于此

1870年（同治九年）6月天津教案爆发，清政府命直隶总督曾国藩赴津办理。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身体状况非常

糟糕，“在署登阶降阶需人扶掖”，“眩晕之症，恐一跌辄半身不遂”，眼疾严重困扰。天津教案发生时，曾国藩正在保定“赏假”疗养。

曾国藩（1811—1872），初名子城，字伯涵，号涤生，湖南湘乡白阳坪人。1838年（道光十八年）中进士，升翰林院庶吉士。1845年（道光二十五年）后，升翰林院侍讲、补日讲起居注官、充文渊阁直阁事。1852年（咸丰二年）兼署吏部左侍郎。后回乡，创立湘军，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统帅。1862年（同治元年），奉旨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，官居一品。在他倡议下，清政府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，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，翻译印刷了第一批西方书籍，是洋务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。

清廷催促，曾国藩抱病从保定起程，1870年7月8日抵津，行辕设在天津知府衙门内（北门里大街大仪门）。曾国藩初到津门即撤掉天津道、府、县三级官员，调江苏巡抚丁日昌担任天津道，负责审理教案有关人员工作。为了加强谈判力量，清政府派总理衙门上行走、署理工部尚书毛昶熙赴津协助曾国藩。8月初，熟悉洋务活动的江苏巡抚丁日昌接到任务，赶赴天津“帮同曾国藩办理教案”。与此同时，他发电报让容闳速到津门，作为译员的容闳“抵津后，尚得与闻末后数次之谈判”。这期间，容闳再次向丁日昌提出留学计划。

曾国藩在理案期间，多次与法国代表谈判无果，陷入僵局。严酷的现实使曾国藩认识到：“洋人遇事专论强弱，不论是非，兵力愈多挟制愈甚。”他“甚为焦急，触发病症”，卧床不起。当时，法国方面提出许多无理要求，清政府担心西方以天津教案为借口，挑起新的侵略战争，便接受曾国藩的建议，急调在陕西镇压起义的淮军，赶赴京畿一带驻防。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后，奉命前往天津会同曾国藩、丁日昌等

人一起处理教案谈判及善后事宜。恰在曾国藩、李鸿章、丁日昌、毛昶熙四位重要官员云集天津之时，丁日昌屡向曾国藩进言，提到容闳的留学计划，并以眼前教案为例分析说明外交人才匮乏的种种弊病，以及实施留学教育的刻不容缓。丁日昌还亲往曾国藩、李鸿章、毛昶熙处面陈留学建议，获得一致赞许。



陈兰彬晚年照

在教案办理接近尾声时，上奏的机会出现了。这一年是曾国藩 60 大寿，10 月 7 日（阴历九月中），奉旨赐寿，由军机处派员赴津咨交御书：“勋高柱石”匾额一面、御书：“福”“寿”字各一方、梵铜像一尊、紫檀嵌玉如意一柄、蟒袍一件、吉绸十件。1870 年 10 月 10 日（同治九年九月十六日），曾国藩专折奏谢天恩，并借机向皇上附奏了《奏带陈兰彬至江南办理机器片》，第一次提出派遣官学生留学的建议。为了加重分量，曾国藩会同李鸿章、丁日昌、毛昶熙四人联衔上《奏带陈兰彬至江南办理机器片》，片中说：“博选聪颖子弟，赴泰西各国书院及军船政等院，分门学习，优给资斧，宽假岁时，为三年蓄艾之计，行之既久，或有异材出乎其间，精通其法，仿效其意，使西人擅长之事，中国皆能究知，然后可以徐图自强。”还推荐说：“四品衔刑部主事陈兰彬、江苏候补同知容闳辈，皆可胜任”并负责办理留学事宜。那天深夜，晚归的丁日昌，唤起早睡的容闳，告之事态进展甚佳。使容闳“闻此消息，乃喜而不寐，竟夜开眼如夜鹰，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，忘其为僵卧床第间”。容闳在《西学东渐记》中记述了奏折送京的情况，他说：“两日后，奏折拜发”，“由驿站加紧快骑，飞递入京，此时曾督及余人皆尚在津沽



也”。后来，曾国藩回忆说：“臣去年在津查办教案，前江苏巡抚丁日昌奉旨前来会办，屡次与臣商榷，打算挑选聪颖少年送往西方各国学校学习军政、船政、测量计算、机器制造等学科。”

考虑到容闳势单力薄，做事缜密的丁日昌推荐汉学功底深厚的陈兰彬（字荔秋，广东吴川人）作为帮手，负责留学生汉语传习。经曾国藩、李鸿章等人首肯，留学事务所的领导班底在津已见雏形。容闳记述说：“数日后，津中有为曾、丁诸公祖饯者，予及陈兰彬均在座，丁抚遂为余等介绍。予之与陈素未识面，今则将为共事之人矣。”老友丁日昌离津前，与容闳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，说明安排留学领导班底的用意，他说：“君所主张，与中国旧学说显然反对。时政府又甚守旧，以个人身当其冲，恐不足以抵抗反对力，或竟事败垂成。故欲利用陈兰彬翰林资格，得旧学派人共事可以稍杀阻力也。”可见，丁日昌为成就容闳的事业用心良苦。10月17日（即农历九月二十三日），曾国藩离津，前往北京面圣。不久，曾国藩与李鸿章等人呈同治皇帝（实际上是向垂帘听政的慈禧、慈安两位皇太后）的会奏，由两宫太后批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复议，成为中国近代留学运动的开端。

1872年（同治十一年）6月，容闳先行赴美安排一切。1876年（光绪二年）12月，容闳被任命为驻美国、秘鲁和西班牙副公使。1881年（光绪七年）7月，清政府决定关闭留学事务所，在美留学生全部撤回国内。经容闳苦心经营的留学活动被扼杀在摇篮中。容闳担任副公使期满回国述职，曾向李鸿章揭露吴子登的丑恶行径，但已无法挽回局面。

后来，容闳寓居北京，曾提出建设国家银行与筑造天津至镇江铁路的计划，因遭受种种阻挠未能如愿。他同情康梁变法，拥护新政，称光绪皇帝为“爱国之君，且为爱国之维

新党”，“其举措迥异常人，洵伟人也”。容闳的“寓所，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”。他在上海组织中国强学会担任第一任会长，热心参与变法活动。

变法失败后，容闳流亡海外，由中国香港转居美国。1912年4月20日，病逝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沙京街284号，享年84岁。

2. 三份重要历史文献

① 《奏带陈兰彬至江南办理机器片》

1870年10月10日（同治九年九月十六日）

曾国藩 李鸿章 丁日昌 毛昶熙联衔于津

四品銜刑部主事陈兰彬，经臣于上年正月奏调来直襄办一切，深资膂力。该员实心孤诣，智深勇沉，历练既久，敛抑才气，精悍坚卓，不避险艰，实有任重致远之志。臣九月初六日奏陈海上练操兵之法，其要全在船主得人。目下中国轮船，于驾驶出洋尚未练习，欲求已成之材，可为船主者，自属不易多遇。将来召募之始，必先择闽粤沿海之人不憚风涛者，使之学习掌舵看火测量沙线等法，以期渐就娴熟。该员生于粤东，留心兵事，若令延揽将才，于轮船操练事宜，必有裨益。至外国技术之精，为中国说不逮。如舆图算法、步天测海、制造机器等事，无一不与造船练习相表裹。其制则广立书院，分科肄业；凡民无不治学，其学皆专门名家，每治一艺，每制一器，皆系父子相传，世继其业，然后入微合漠，愈久愈精。其国家于军政船政，皆视为身心性命之学。